

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与文化上层建筑的内在逻辑

刘明明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按照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所塑造出的全新财富观、职业观、消费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亦扮演着为其经济制度辩护的功能。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文化精神,才能更加坚实稳固。根据唯物史观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文化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培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核心价值观等精神,而这些先进文化精神的培育又反过来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

[关键词] 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文化上层建筑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4-0022-12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经济基础,它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产物:一方面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现实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它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与之相适应。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因此,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客观上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相比而言,经济基础也决定文化上层建筑,但对二者之间的逻辑考量似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理解不无关系,即认为只要搭建起经济基础,就一定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化上层建筑。按照这样的认识路线,我们的重心放在了基本经济制度本身,而很少关注其是否会构建起我们所预期的文化上层建筑,更不去思考文化上层建筑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反作用问题。因此,本文将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其文化精神的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文化上层建筑的关系。

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文化精神

众所周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在这两组矛盾

[收稿日期] 2022-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20MYB022)。

[作者简介] 刘明明(1986—),男,山东临朐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研究。

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先发展起来,然后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力率先发展起来,继而带动以私有制和劳动雇佣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下来。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只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通过剥削工人而获得的财富,随时都有可能被以封建国王和地主为代表的旧统治势力夺去,所以,接下来,他们不仅要去控制观念上层建筑,也就是鼓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让全社会都认可他们所主导的生产方式,他们还要去夺取政治上层建筑,也就是国家政权,这样可以依靠暴力机器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中的运行逻辑,在其运行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三个关键领域,即经济基础对应着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对应着政治结构,观念上层建筑对应着文化结构。其中,观念上层建筑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它不像经济和政治那么直观,反而给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假象。其实不然,在整个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行过程中,资产阶级并非一味地追逐财富,他们极为重视观念上层建筑的建设。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向世人呈现了观念上层建筑在西方资本主义孕育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新教伦理催生了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发展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相比于以往的宗教,新教对劳动、财富和消费这三个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一是推崇劳动和职业。以劳动为代表的世俗经济活动在宗教改革之前处于被鄙视的境地,但新教赋予了劳动以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根据新教教义,人人都应该劳动,即使拥有财富也不能逃避劳动,而职业是上帝为人类发布的指令,这一指令要求人们要为增加上帝的荣耀而劳动。这样,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成为荣耀上帝的方式,劳动就得以升华为信仰,爱劳动就是爱上帝。因此,“一个具备能力的人,却通过乞讨来维持生活的做法,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他的这种做法不但表示他非常懒散,还表示他侮辱了上帝的博爱。”^{[1]136}而且,对上帝的信仰还延伸到日常工作的态度上,皈依新教的人要认真且井井有条地进行工作,这成为判断其是否虔诚的标准。此外,新教鼓励一个人兼顾多份工作,只要这些工作有利于公众或个人,不会损害别人,且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即可;新教允许人们更换工作,这不会被看作是背叛行为,而是从事更能让上帝感到欣慰的工作。新教的教义倡导人们努力工作并可以自由流动,这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

二是鼓励人们追求财富。自古以来,大多数宗教都对金钱和财富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扰乱了人的心智,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因而视金钱如粪土;但是,新教赋予金钱和财富以全新的解释。根据新教的教义,一种职业如果符合上帝的意愿,就会带来财富;一个人通过努力奋斗获得财富的行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完成上帝的圣意。因此,追求财富并非一种可耻的行为,而是服从上帝的指示,获得的财富越多,越是在“荣耀上帝”。尽管鼓励人们追求财富,但新教反对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反对通过欺骗和贪婪的措施来实现个人目标,这样就对人们获取财富的手段和方式做出了限定。尽管新教放开了以往社会对人们追逐财富所设的闸门,但没有任其自流,而是约束其流向,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规制市场不当行为的角色。

三是鼓励人们节制消费。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新教的解释是按照上帝的指示得来的,所以财富不属于个人,而是上帝的,人只是上帝的财富保管者。因此,如果一个人追逐财富的目的是为了过一种衣食无忧甚至极为奢侈的生活,那么他就是在违背圣意。由于人们的财产是来自于上帝的恩赐,所以人们必须像上帝的奴仆那样照顾好上帝的每一个便士。“他假如将某些金钱用在了自身的享受而不是‘增加上帝的荣耀’上,那么他便是在进行一种冒险活动。”^{[1]143}新教提倡人们过一种

禁欲主义的生活,要限制奢侈品的花费,因为奢侈品是一种肉体诱惑。在获利自由和消费限制的共同作用下,资本积累就会成为必然的结果。少量的财富用于个人必要的花费,越来越多的财富被用于生产性投资。

新教破除了人们对劳动、财富和消费的陈旧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事实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假如拥有十分复杂的宗教成分,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家、工商界领袖、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那些受过商业及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者,大部分都会是新教徒。”^{[1]21} 韦伯没有明确指出新教伦理到底孕育出了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我们可以根据他对新教伦理的分析和所引用的富兰克林语录来断定: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不再将赚取财富视为不道德或羞耻的行为,而是将其视为一项高尚的事业,人们应该诚实守信、珍惜时间、节制消费、忠于职守,将财富不断进行再投资,推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履行社会责任。

韦伯不仅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还试图论证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受阻与儒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后者的洞见体现于《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除了缺少形式上受保障的法学和理性的行政、司法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则是存在于中国人的‘气质’之中并为官员及候补官员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在韦伯看来,这种气质和态度正是来自于儒教的熏陶:一是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需要建立在良好的信任基础上,但是“官方的独裁、因袭的不诚实,加之儒教只重视维护面子,结果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猜疑”^{[2]243};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建立客观的经济关系,但是儒教构建的都是纯粹个人关系和亲戚关系,没有形成理性的“企业”和客观的经营关系;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将积累的财富用于再投资,但是儒家学说把“精打细算”和寡欲提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积攒财富是为了确保葬礼和好名声,为了享受“有钱”本身的荣誉与快乐,缺少再投资的刺激和动机;四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是经济训练,但儒教伦理鄙视经济职业工作,反对专业化,只推崇书本教育,没有形成专业教育。最后,韦伯对儒教徒和清教徒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并总结指出:“典型的儒教徒使用自己以及家族的储蓄去获取典籍的教养,并接受训练以应付考试,以此为取得一个有名有利的地位打下良好的基础。典型的清教徒则挣得多,花得少,出于禁欲的强制储蓄的愿望,将所得变为资本,再投资于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2]253}

作为资产阶级的典型学者,韦伯的观点存在美化资本主义和推崇新教、矮化中国文化和贬低儒家学说的严重倾向,存在夸大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但他确实指出了文化意识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孕育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时至今日,文化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突出体现在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辩护上。

首先来看民主社会主义,它的底色是改良主义,它的产生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新变化,即议会斗争和合法选举为人数占优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政议政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民主社会主义被视为是社会民主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被划入资产阶级右派的阵营;但在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代表着右翼,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典型的左派。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这些国家将自由市场与政府强大的公共服务能力结合起来,针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试图予以匡正。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普遍的民主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民主的监督改造企业管理和运营的方式,用共同参与的民主来补充政治民主,普遍主张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但这种程序民主在不触动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只能流于形式。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潮都建基于其上,并反过来为之提供意识形态盾牌。民主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披上了人道的外衣,遮蔽了其狰狞的面孔。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和渗透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民众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同:一是公有制经济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私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民主社会主义在所有制形式上不断倒退,从最开始支持公有制和国有化,到现在已经完全认同私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认为无需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强化政府的税收能力和完善政府主导下的福利制度也能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均衡分配。二是资本主义在福利制度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福利政策属于分配制度的范畴,它本来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名片,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施效果不佳。民主社会主义把福利提到人权的高度^[3],凭借着在世界市场获得的超额利润,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在面对美味的烤牛肉和苹果派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化为了乌有。”^[4]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渲染下,福利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甚至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些人士也受此蛊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要优于社会主义国家。

再来看新自由主义,以学术话语形态存在的新自由主义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否认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能性,鼓吹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先锋。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从理论主张上看,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干预,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典型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从阶级立场上看,新自由主义“表达了资本家阶级与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财务经理人联合起来,试图强化自身的霸权地位并将该霸权地位扩展至全球的战略”^[5]。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同属资产阶级的思想,前者反映中下阶层民众的诉求,后者代表资本家阶层的利益,二者的存在规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思想张力。

在许多人眼中,新自由主义是一股单纯的经济思潮,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具有心理、政治、社会乃至国际因素的全面的意识形态^[6]。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辩护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私有制经济摇旗呐喊。新自由主义将私有企业美化为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而给国有企业贴上低效率和腐败寻租的标签,主张对公共资源进行彻底的私有化。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深刻地影响到了政客、学者和民众的认知,以致国外激进的左翼学者大都放弃了对公有制的坚守,而追求工人合作社或混合所有制等形式。二是鼓吹彻底的市场化。新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沆瀣一气,将自由市场封为圭臬,认为整个社会的福祉完全可以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而不断改善,要求资本、劳动、商品和服务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经济与国家权力对立起来,认为市场化可以抵消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和民主的侵蚀,因此,反对国家干预。这样,新自由主义塑造了一种为自我辩护的文化体制,这种文化体制把价格和利润烙印在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7]。三是为经济不平等洗白。新自由主义政策必然带来贫富差距悬殊、国家福利减少、资本操控一切等后果。为了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新自由主义“创造出重新塑造自由和权威含义的强大叙事来为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辩护”,在新自由主义的运行逻辑下,“自由被完全地从市场的角度来定义,不平等被视为美德,私有化的逻辑对公民的同情心及社会福利嗤之以鼻。”^[8]

综上所述,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上层建筑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基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上,也反过来为之服务和辩护。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文化上层建筑的培育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土壤决定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并且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观念上层建筑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因此,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鼓吹私有化、质疑国企效率、要求完全市场化的声音。对于思想理论界来说,批判错误思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通过批判可以帮助人们认清错误思潮的本来面目,但错误思潮是不可能因为理论批判而销声匿迹的,这是由其现实土壤决定的。对此,我们要通过基本经济制度培育出坚实的社会主义精神,以此挤压错误思潮的生存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9]47-48} 这里的“精神”即是观念上层建筑。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发展经济和建设文化一直是重中之重,而且二者相辅相成。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文化上层建筑也随之有了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上层建筑既要站在人类社会的道义制高点,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建设的关键,也要服务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着眼于激发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将敬业、诚信和友善作为培育的重点。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精神的培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10] 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它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制度保障,通过带领中国富起来和强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满足人民的需求,可以激发人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具体而言:

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富强之路。从1840年开始,无数仁人志士一直在探索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完成了站起来的历史任务后,如何富起来和强起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需解答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苏联模式也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方案。因此,拨乱反正后,首先要变革的就是陈旧的经济模式,探索建立起符合生产力实际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充分证明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它完全可以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下探索出来的,它表明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没有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中国。

第二,从制度模式的比较来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展现出明显的优势。落后挨打是近代史以来我们民族的惨痛记忆,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效率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包括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市场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等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经济腾飞的密钥,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锻造这把钥匙的工匠。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让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理解

了党的领导这一制度优势,因而更加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也更加深入人心。

第三,在价值取向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资产阶级的政客一直冠冕堂皇地将自己包装成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所谓的“人权”价值观也成为西方国家肆意挥舞的大棒,但在新冠疫情面前,资产阶级的唯资本和唯选票逻辑暴露无遗。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理论和实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它之所以没有像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那样流于形式,源于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作为物质基础的公有制经济,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它还有社会效益的维度。在经济建设时,它服务于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协同等重大战略,在突发紧急事件时,它可以不惜代价地投入救援、提供支持和做好保障。因此,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物质基础。从政治基础上看,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党的执政地位可以确保人民至上的理念在国家的方方面面得以贯彻。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中国共产党人冲锋在前,奋斗在各个关键的工作岗位,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全力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凸显了自身的先锋队本色。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培育

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孕育出的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价值的精神,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则为集体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主义的培育手段丰富多样,包括学校教育、影视题材和先进事迹等,但是根基在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成为维系共同体成员的经济纽带。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利益有所忽视;二是集体主义的驱动力主要不是物质激励,而是精神鼓励和意识形态宣传^[1]。

相比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集体主义进行了重塑:一是更加重视个人的利益和价值,但没有走向个人主义的极端。市场经济本身崇尚自由交换,这赋予个人以充分的经济自由,集体成为自由人的联合。新的集体主义精神充分保障个人利益,鼓励个人在不损害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获取正当利益和财富,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被充分激发,集体的经济蛋糕不断被做大。二是集体的价值没有被消解和湮没。市场经济是个人主义滋生的沃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个人的集体主义意识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有所减弱,但胜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同样实行市场经济,我国的集体主义依然浓厚?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可以让相当一部分人在集体企业中工作,在联合劳动中培育集体主义意识,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也让全体国民在所有权上结为一体。三是市场经济并非与集体主义不兼容。从宏观的角度看,与各行其是的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它本身的运行需要各行各业集体协作完成。从微观的角度看,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通力合作是确保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在客观上推动着团队意识的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代集体主义的动力来源。计划经济时代,在全民热火朝天兴修水利的过程中,民众感受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和伟力,实现了改造自然与改造自我的统一。今天,人民群众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中能够形成对集体主义的认同。面对席卷全国的新冠疫情,各行各业不分党派、民族、阶层和职业都投入到了阻击疫情的战斗中,并在举全国之力防控疫情的战斗中,人们接受了集体主义的熏陶。

(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限于篇幅关系,本部分的重点在于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由于爱国主义在前面已有论述,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敬业、诚信和友善的培育成为分析重点。

敬业是社会财富创造的精神保障,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无不建立在敬业精神的基础之上。它有两点要义:一是尊重和热爱劳动,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二是对工作抱有热情,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敬业精神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为敬业提供正面激励。敬业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表现出尽职尽责的主观态度。作为一种主观精神,宣传教育和树立典型对敬业的培育有一定作用,但要想实现这种主观精神的持续保持和升华,进而构建起敬业型的社会氛围,就离不开物质方面的激励。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意味着只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就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和收入。一个人的敬业程度与其所得是成正比的。相反,一个人如果在工作中散漫敷衍,无法为企业和社会做出业绩贡献,将获得较少的收入,甚至可能会失业。第二,敬业是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立足的基本要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分配的平均主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与收入所得不成比例,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不高,消极怠工现象严重;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如若不想被淘汰出局,就必须爱岗敬业,为他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可以说,市场经济为各个市场主体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凡不敬业者,皆有可能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诚信的要义是个人或组织在社会交往中以诚待人不欺骗、信守诺言不违约。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社会存续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诚信的培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诚信是企业赢得市场的基本要求。只有诚信经营的企业,才能吸引牢固可靠的合作伙伴,形成稳定的上下游渠道,也才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对于那些偷工减料、缺斤短两、质次价高的经营者,他们可能会一时谋取不义之财,但随时会被淘汰出市场。另一方面,诚信是个人职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个人以追求职业的成功为奋斗目标,不择手段、算计他人和欺上瞒下都不是“捷径”,而是绝路。只有诚实守信,坚持合作共赢的态度,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配合。失信者在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将寸步难行,而守信者则会畅通无阻。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守信的正面激励和对失信的负面约束来培育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从功能上看要协调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它要求每个公民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要平等待人、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与人为善,共同营造和谐融洽的社会风貌。友善可以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基因,不管是儒家的“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还是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无不蕴含着深刻的友善思想。核心价值观将友善列为其中,体现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友善能够成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和交往准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第一,“公有共益”。公有制经济是从熟人社会迈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维系社会成员的经济纽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纽带被解构、淡化和斩断,人的生存状态呈现原子化,有走向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危险趋势。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利益分歧,

矫正个人主义倾向,因为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是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根本分歧的。每个公民在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上是平等的,夯实了平等待人的物质基础。第二,“同舟共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意味着社会成员在合法的前提下可以各尽所能,各展所长,赚取财富和创造财富。这种分配结构必然形成先富和后富的分界,为富不仁和仇富心理也成为伴生现象,但是贫富差距扩大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维系共同体成员的另一个纽带,它给生活贫困者传递出“困难是暂时的”信心,给生活富裕者传递出“适当回馈社会”的责任。每个社会成员围绕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同舟共济,可以形成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第三,“和气生财”。市场经济虽然强调竞争,但参与竞争的各方是有血有肉的人。市场主体在决策时,既有理性思维的主导,也有感性认识的参与。由于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自由交换、自由选择的经济,那些友善的人更容易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而那些专横跋扈、盛气凌人、专横霸道的人可能通过不正常竞争短时获利,但不可能持久立足。

三、文化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反哺作用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孕育文化上层建筑,而文化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夯实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我们必须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引导,使其为基本经济制度服务。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哺作用

“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12],从反哺作用上看,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有利于夯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国内外敌对分子一直试图动摇这两大根基,他们不惜颠倒黑白、诽谤中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社会主义污蔑为没有人权和自由的极权国家,这些反动思想的渗透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培育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精神就能维护政治稳定的大局,从而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完善和贯彻执行提供政治保证。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奠定群众基础。虽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仍有一些国内外人士质疑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甚至可行性。爱国主义精神可以凝聚共识,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这个共识就是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本经济制度会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各族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不断壮大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国民经济,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使我国经济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跃升至新的台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各族人民互助互爱,济困扶贫,实现共同富裕。

(二)集体主义精神的反哺作用

集体主义作为文化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反哺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弥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客观而言,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它为市场主体的自由发挥提供了场所,充分调动了他们追逐财富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成为错误意识和行为滋生的温床,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为典型,即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己,集体利益被降低为从属于个人利益,甚至集体被蚕食为空壳;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对社会和集体的事业漠不关心;在获取财富后,只顾肉体上的享受和刺激,不讲对社会的奉献。要降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就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管控和限制。这一方面

需要法律法规的硬约束,另一方面需要集体主义的软约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有其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13]第二,集体主义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壮大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于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来说,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可以提高他们工作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发他们的奉献精神,减少消极怠工,避免损公肥私,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人而言,集体主义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团队协作的精神,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三,集体主义有助于在分配上实现共同富裕。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手段,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是目的。可以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也是本质特征。互帮互助,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和追求。集体主义有助于提高先富起来的地区 and 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从精神层面驱动他们带动后富的地区和个人。一些企业家在创业成功后陷入精神空虚,因此,需要培养他们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集体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9]264}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反哺作用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敬业精神的孵化器,也可能将敬业精神诱向异化。敬业精神需要物质激励,但当个人和组织将其敬业程度完全与收入回报挂钩时,敬业就从高尚沦为庸俗,敬业中蕴含的无私奉献精神被消解。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拜物教也对敬业精神造成了巨大冲击:有的人丧失进取精神,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有的人在择业时挑肥拣瘦,盯着“钱多事少又体面”的工作,不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有的人在工作中“钱多就多干,钱少就少干”,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充分表明培育敬业精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敬业精神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反哺作用来看:第一,敬业精神有利于做大做强国民经济的大蛋糕,壮大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发挥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管理层和企业员工能否体现出百折不挠、竭尽全力和共克时艰的精神,将直接影响企业转危为机的能力。无论对于在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内的劳动者来说,我们都要弘扬敬业精神。只要我们每个人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本职工作,努力成为行业内的行家里手,无疑将助推我国的民族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壮大,在涓滴效应下,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第二,敬业精神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的分配制度承认个人收入的差距,但终极目的还是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此,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将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脱贫需要外力帮助与自我努力相结合。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个人或家庭陷入贫困不是因为疾病、失业、自然灾害或地理环境等,而是因为好逸恶劳,没有进取精神。脱贫先扶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社会都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14]我们要反对“吃低保光荣”的懒汉思想,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就业实现脱贫,而不是完全依赖社会救济。第三,敬业精神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生产者来说,敬业精神意味着要市场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反对以次充好、掺假卖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对于就业者来说,敬业精神意味着干一行、爱一行,创新争优,争做合格的劳动者。各个市场主体克尽职守、诚信经营,反对尔虞我诈、欺蒙拐骗,将营造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可见,敬业精神通过对生产者、就业者和市场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硬通货”,失去诚信的支撑,市场经济将是无根之木。诚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反哺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诚信将约束消费者的不当行为。消费者的诚信问题往往很容易被忽视,但这对于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却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消费者失信行为主要表现为恶意透支信用,进行奢侈消费;滥用无理由退货,提高商家的运营成本;恶意差评,滥用投诉,宣泄个人的主观情绪等。这些不良行为冲击着市场的正常秩序,需要以诚信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予以纠正。二是诚信将约束就业者的不当行为。员工是单位运行的基本细胞,如果员工在工作中弄虚作假、敷衍应付、吃里扒外、损公肥私,那么其所在单位的竞争力无疑会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培育就业者的诚信意识,让每个劳动者将诚信作为自己职业不可逾越的底线。三是诚信将约束生产者的不当行为。个别生产者为了牟取更多的利润,不惜铤而走险,从事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贩假等违法失信的行为,这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因此,“公有制企业也好,非公有制企业也好,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9]265}

友善是针对个人的道德规范,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融洽程度影响整个社会运转的流畅和秩序。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友善将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和市场经济这三重因素可以激发经济的活力,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残酷的竞争也将成为各个市场主体必然面对的法则。竞争带来的贫富差距和优胜劣汰都会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甚至出现对他人的疾苦冷眼旁观,对他人的善意抱以疑虑,对他人的安危置之不理等情况,导致市场主体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提防。当冷漠与紧张成为主宰社会运行的旋律时,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会增加,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会降低,社会的凝聚力会下降,社会秩序将面临崩盘的危险。因此,我们要在友善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竞争观。竞争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壮大国民经济的手段,这种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不应成为主导人们社会交往的准则。友善正是对竞争所产生不良效应的一种预防和矫正。对于个体而言,在团结友善的社会中,人人都会参与竞争,但人们之间以礼相待,心情舒畅,从而可以高效率地投入到工作中;对于社会而言,友善将有助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多种分配方式的公平贯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结 论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沃土,而后者也会对基本经济制度产生积极的影响。无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社会主义精神文化要想深入人心,单纯依靠宣传教育是行不通的,它需要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强力支撑,而稳固的经济基础不是依靠政府出台意见和决定就能确立下来的,它也有赖于精神文化的反哺。研究分析二者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夯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重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文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在二者的相

互关系中,政治上层建筑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一,政治上层建筑为文化上层建筑的培育提供法律和强力保证。基于个人思想倾向的多变性、国外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基本经济制度本身有产生非主流思潮的可能,政治上层建筑的强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法律上惩罚颠覆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遏制失信行为,打击损公肥私,可以形成有效的震慑和约束。例如:香港国安法是打击“港独”分子的利剑,使得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法可依;《反分裂国家法》是震撼“台独”分子的武器,使得在关键时刻采取非和平手段维护国家统一有法可依。对于文化上层建筑的培育来说,经济基础和政治约束二者缺一不可。

第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政治上层建筑奠定物质基础。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劳动人民创造的大多数财富掌握在人民手中,因此,人民完全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鼓吹主权在民,但囿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人民主权浮于形式。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5]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它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公有制经济无疑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没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政治上层建筑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驾护航。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来说,文化上层建筑属于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民大众,而政治上层建筑则直截了当地划出红线。以宪法为例,宪法制度属于典型的政治上层建筑,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而来。我国宪法第六条针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6]10}宪法第十五条针对市场经济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16]13}如此,赋予基本经济制度以宪法的神圣性。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刘作宾,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 [2] 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3] 徐崇温.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9.
- [4] 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M].孙丹,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143.
- [5] 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赖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M].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
- [6] 张茂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访剑桥大学大卫·莱恩教授[J].国外社会科学,2019(01):145—150.
- [7] 丹尼尔·罗杰斯,吴万伟.新自由主义辨析与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2018(06):43—49.
- [8] 亨利·吉鲁,吴万伟,张琪.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2018(12):48—56.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0.
- [11] 邵士庆,刘文佳.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的逻辑生成及其运行方式转型[J].新视野,2012(05):95—98.
- [12]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7.

- [14] 习近平.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5.
- [15]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5.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责任编辑:蒋萍)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Cultural Super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U Ming-m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ultural spirit of capitalism. According to Weber, the new outlook on wealth, occupation and consumption created by the Protestant ethic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Even in today's capitalist world,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neoliberalism have served as apologists for their economic systems. Therefore,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must have a corresponding cultural spirit, in order to be more soli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economic base determines the cultural superstructure.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patriotism, collectivism, and core values, in turn, the cultivation of these advanced cultural spirits, serv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ism; basic economic system; cultural superstructure